

# 从叙事和语言节奏去读《文城》

小说家班宇给人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，但其实他经历了漫长并且充分的准备期，更长期保持对小说、写作等事物专注而且艰难的思考。栏目主持人李黎和班宇就阅读、诗歌等话题展开对谈，就余华的新作《文城》，班宇也给出了他意犹未尽的“读后感”。

对  
话

1

李黎：《冬泳》和《逍遥游》之后，你在写什么作品？如果按照乔伊斯写完《都柏林人》后写《尤利西斯》的逻辑，你应该在写长篇了。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蛰伏期后爆发了，但后续可能也就结束了，成了转瞬即逝的“流星”——这些你想过没有？有什么应对？

班宇：这两本之后，我有一些新的计划，仍以中短篇为主，暂时没有长篇的打算。我个人很少做长期规划，最近也是在修改手里的几篇作品，进度较慢，如果这一批没改出来，或者还没想好是否要放弃，那么便很难将情绪投入到更遥远的时间与领域里。事实上，我的蛰伏期不算漫长，甚至谈不上什么蛰伏，没写小说之前，我也有过十几年的写作经验——需要说明的是，那些经验也并非在为小说做准备。我写小说的状态很像临时被替换上场，没怎么热身，阴差阳错，传出去几脚球，结果也是未知的，可能跟风向、温度、湿度都有点关系。教练组和我本人都没抱太高的期待，所以我想，转瞬即逝也许是一种必然的命运，一种自然规律，无法违背，不太需要去刻意抵挡。与之相反，我觉得持续“闪亮”状态的写作在目前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精神困境。“闪亮”也不是一件能够确切预知的事情，甚至跟作品本身的关系也不太密切。我在写作里有着自己想要实施的事情，跟这些瞬间无关，也不足为外人道也。这是我非常隐秘的想法。

李黎：《冬泳》和《逍遥游》距离一年多，乍一看后者沿袭了前者，但我觉得后者更为真诚、去戏剧化，还有一些文本上的野心。你怎么看待这两本书？怎么看待它们承载的所谓“东北文艺复兴”？

班宇：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这两本书其实有着一致的方向，但绝不是地域性的。写作时间有先后，也相互渗透，但在创作初期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，那就是它们均不承载任何的复兴功能，不存在着这样的愿景，所以这更像是一笔额外的开销，非常被动，坦白来说，我至今仍在为此还债。所以，这两本书最大的意义也只能落在我自己身上，不是展示面貌或者解释变革，不是落寞与呐喊，不是讲述一群人或者一代人，只是一个人。我在写作时有很多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对词句、节奏、故事情节的反复测量与审问，那些是我所珍惜的黯淡时刻，也是这两本书所赋予我的精神历程，我能确切地感受到正在进行着何种搏斗。出版之前，我会对收录的小说进行反复修改，但成书后，基本上就没再翻开过了。不是认为它们业已完成，而是仍有无尽的缝隙与缺失，让我觉得无所适从。

李黎：你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一些普通人，城市平民，但如果用“底层”“边缘”，甚至“弱小者”“卑微者”“多余的人”来形容又显得有些过分，并且容易陷入卖惨的操作，你对此应该是有所警惕的。但他们确实是简单和质朴的人，既有经济

方面带来的限制，又有某种耿直干脆的地域风情。他们对简单事物真心实意的满足让人动容，有时候想想，这几乎是一种古训，一种被拉到最低处的人生最高目标。平安、平静、了却一桩心愿，甚至，活着就好。有评论称之为“新工人阶层”的某种写真，让人联想到《铁西区》。你说不是写一代人或者一群人，那么相对密集出现的同一类人，是因为身边都是类似的亲朋，或者是你本人也曾经处于类似的状态下？

班宇：这个描述特别好，“被拉到最低处的人生最高目标”，那么，或许也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，就是所有这些简单、粗糙、略显落寞的形容词，依然很难触及到这些人物的核心。如果我的小说有一部分原型的话，我想也并非实体，可能是一种气态的存在，动能高，形态不受限，且有着一种强烈的扩散欲望。扩散的也许是抒情传统，或古典精神，或作为原子的存在与流动本能，进而形成了对于生命的复写，即一次自我技术的实践。这样的同一类人不仅是政策与历史环境的产物，对于此刻而言，也是一种濒危的史前形态——在一座荒芜的庙宇里开展猛烈的祭祀。像是被无数匹疯马来回撕扯，内在的力要被重新组合、分配，以对抗不同方位的牵引。我觉得与其以地域与阶层进行划分，不如从时刻这一角度来谈，我们始终位于不同的生命时刻和世界时刻里，没有共时，没有前后次序，完全不是线性的。这样的时刻是一个横截面，既不在前方，也不在身后，而是突如其来，凭空而落，直接切中要害，使得我们只得在此进行呈现，一览无遗，没有任何躲避的方式。

2

李黎：虽说你笔下的人物都有种忧伤愁苦，往深处看也是愁云密布，但他们都一直在行动，忙活不停，小说也有种特别流畅的阅读享受。这是你的叙述能力和日常生活本身结合的神奇效果，但你似乎不太满足这些，《逍遥游》最后一篇《山脉》，既让人觉得很错愕，又觉得你可能在将来会冷不丁抛出一个特别不同的作品出来，就像你突然写小说一样。《山脉》大概写于什么时候？你对它有什么期许？

班宇：《山脉》大概是在2018年初写完的，算是《逍遥游》这一本里完成得比较早的，当时可能写了一周有余。最初的动机也很单纯，就是刚写好了几篇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，内心还是不太满足，想在文体和形式上有一些新鲜的尝试。《山脉》这篇小说由五个部分组成，在这里我完成的可能是一次对于小说作者的扮演：只有作者，没有小说。当时想将其做成一篇“反小说”的小说，不仅是没有故事与主要情节，连这几部分的组合秩序也不是恒定的，关系看似比较松散，其实互有连接。小说里还有一张山脉里墓穴的示意图——其形态源自大熊星座。也即，这篇小说跟天文考古学有那么一点点的联系，包括对《山海经》相关资料的研究与化用等。在我看来，整篇小说或许更接近某种装置艺术，可能有点冒

犯，其意图在于阻断读者对小说的一般理解路径，将一个不断消逝着的故事悬置其上，而剩余的补充文本像是一声声召唤，时远时近，为之奋力赋形，我想以这种方式去试图触及现代小说的某种本质。当然，在这篇小说的叙述背景里，确切有着一个相对完整的、近似于神话的故事本体，但这也不重要，它更像是一个坐标系，其存在是为了使那条抛物线得以显现。

李黎：最近你看了《文城》并发表了评论，评论的最后是，还有一些可以说的，但这次算了。那么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多说几句？

班宇：我的视角完全是从一个小说作者出发的，所以会认为《文城》里可以学习、借鉴之处比值得批评的地方要多出数倍。在我看来，《文城》最出色的部分是叙事和语言的节奏，不是通顺、流畅等词可以概括，像一曲爵士乐，有很多往复的变化，又都比较自然，不露痕迹，这点不好达到，需要仔细调校。如果只是简单说说的话，也还不够明确，那么不妨试着自行摹写几段，再做通读对比，可能感触会更深，也包括情节上的创造与选择。另外，整部小说虽然读来像一则漂浮的寓言，但背后的功夫做得极其扎实、充沛，不只是几个人物形象，包括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，村庄的语境、政治、经济与伦理等。虽然在小说里没有更多的展示，但也完全可以感觉到作者对此有着绝对的把握，若非如此，那么写下的任何一句都将呈现相互驳斥的凌乱状态，难以成立。当然，我觉得也有些遗憾，在语言的细节方面，也许还不够缜密，例如一些比喻和成语的使用，或可再作讨论。但精细紧致的语言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因何成为标准？其代表的又是何种标准？谁的标准？我想这是另一个可以讨论的更大的命题。小说文本是一方面，就此引发的现象则要另外再谈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对《文城》的部分批评跟电影《刺杀小说家》的评价有近似之处，包括对故事情节上的质疑与不信任，好像必须要将人物与行动充分合理化、逻辑化，而我们知道，逻辑与逻辑之间时常是相互对立的，所以对于这一点，我也不太能认同。好像谁都不能彻底说服谁。那么，我更好奇的是，我们到底是怎么丧失这种“信”的？

3

李黎：朋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喝酒时大谈图书电影充满文艺气息的；另一类是几乎不谈这些，更多的是谈人物和往事，你显然属于后者。抛开写小说方面狭义的学习模仿和“见贤思齐”不谈，纯粹让你喜欢，对你有影响的书或者作家都有哪些？

班宇：也不是不愿意谈文艺作品，其实是有点羞怯，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里这样去谈，对于那些不太感兴趣的朋友可能有些不适。谈论日常总归是更安全的，也更有启发。况且，仅仅给出一个观点或立场很容易，但过于轻巧了，基于此的讨论往往很难达成一个明确的结果，整个过程使人疲惫。据我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，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，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浒群星闪耀时》。《读家对谈》栏目嘉宾主持。



班宇

1986年生，沈阳人，小说作者。有小说集《冬泳》《逍遥游》出版。

观察，大家在此时的审美也比较分裂，前一段我也在说，以前人们关注共识之下个体的伟大，现在讲求的是个体之下共识的伟大，这个过程并不可逆，共识之下有个体的凸显，可是个体里根本不会有共识的复现。之前说过一些对我有影响的作者和作品，那么这次说一下最近读到的几本比较喜欢的：胡安·加夫列尔·巴斯克斯的《坠物之声》，张贵兴的《野猪渡河》，罗伯特·洛威尔的《生活研究》，鲁明君的《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：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》和吉尔伯特·西蒙东的《动物与人二讲》。另外，准备重读托尔斯泰、福克纳以及策兰与巴赫曼的书信集等。

李黎：你是一个资深的摇滚乐迷和乐评人，哪些乐队让你印象深刻？摇滚乐自然会和诗歌联系在一起，你也写过一些诗，而你多篇小说的结尾更是充满了一种清晰的诗歌意味，伤感、空旷，回味无穷。这些事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？

班宇：资深谈不上，兴趣始终未减。此刻正在听两张新作，来自舌头和疯医乐队。我不是每天都写，但都会听几张唱片。写有时候是为了不写，听却是为了继续去听。我很喜欢在小说里埋下一些关于音乐的伏笔或者线索，比如最近完成的《活人秘史》，对先锋音乐场景有所了解的朋友，读后也许可以收获一些额外的乐趣。我觉得这点很重要——你不能一直朝着所有的人去诉说。另外，音乐的发展与进化过程也可与小说相比，若在技术与乐器上面再不发生革命，那么音乐便很难在语言形式上有所突破，未来的音乐更像是一次次“模拟”。比起小说阅读，我在平时花在诗歌上面的时间更多，虽然历史与知识脉络也不清晰，全凭感觉，但确实有着比较强烈的渴望，也搞不清从何而来。这样说来，它们与我的小说之间的关系似乎不能也无法分离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在写小说时，虽然使用相关的元素与意象，却也是为了完善小说自身的述说，所以很难说有着特别直接的影响。我内心很希望能有一次正面强攻式的书写，但还没想好到底要怎么做。

李黎：印象中你来过两次南京，它和沈阳肯定是大不相同的，但在我的感觉中其实有很多类似之处，特别是有种非常相像的不精致，另外南京曾经也是重要的化工城市、轻工业重镇。你来南京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
班宇：去过不止两次，总共有四五次。最近一次是去年九月份的，在欧拉空间看了一场野外合作社的演出，以剧场的方式又有影像文本的介入，算是音乐演出的一种进化形态，之后又跟朋友欢聚两日，聊得极开心。我在南京时，其实感觉不到特别南方的气韵，跟我所在的城市在整体气质上有点接近，总处在未竟的生成之中，服膺于新规则的同时又在蛮横地抗拒着一些侵蚀，亟须建设自身的新的传统。但我觉得我还是没能触及到这座城市的核心，因为这里的写作者所呈现的又是另一种样貌，自在、诙谐的语法里又藏着许多真情。我很喜欢南京作家顾前的小说《打牌》，这也使我走在这里的街道上经常陷入恍惚，脑子里反复盘旋着那句：“难道这么多年真的已经过去了么？”

VS